

王晓燕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清代女性

诗学思想研究

QINGDAI NUXING SHIXUE
SIXIANG YANJIU



清代女性

诗学思想研究

QINGDAI NUXING SHIXUE
SIXIANG YANJIU

王晓燕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徐志静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研究 / 王晓燕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614-7367-2

I. ①清… II. ①王… III. ①妇女文学—诗学—中国—清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746 号

书名 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研究

著 者	王晓燕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367-2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5
字 数	12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清代闺秀的生存环境与文学交际	(5)
第一节 清代闺秀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6)
第二节 清代闺秀诗歌实践的创新与交际面的突破	(18)
第三节 清代闺秀诗学思想的多元化形成方式与途径	(29)
第二章 独立接受下的性灵诗思——女性诗学观念的自我评议	(45)
第一节 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的独特性	(45)
第二节 清代女性诗学立场的中心命题——诗教自觉？立论策略？	(80)
第三章 时代辐射中的他者定位——文士对女性诗学观念的判定	(89)
第一节 清代性灵派文士诗学思想界定的独特性	(90)
第二节 清代格调派文士的女性诗学观及文化策略	(125)
余 论	(151)
参考文献	(154)

引言

清代女性文学发展到历史的极盛期，出现了许多极复杂有趣的女性文学现象。一方面女性作者的身份，明确地由青楼女子向闺秀女性成功过渡，由俗及雅，为闺秀宏富、深刻而又相对自由完整的女性文学创作展开了一页新篇章；另一方面萌芽于中国封建制土壤中的女性文学不得不受到许多生活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曼素恩所言，从降生到生命的终结，一位普通女性的心灵智慧更多地消灭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之中，因此，其精神的希求与显露就显得格外珍贵。一方面，虽然部分闺秀女子仍然深受贞洁节烈观念的影响，其吟诵也并未超越旧有的伤时惜春、孤芳自赏的情结，但更多的闺秀则大胆突破陈俗，将对个性解放的渴望、对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人情世态的品读以及对人之命运的关心融入自己的诗歌心灵史之中，与文士之作一道汇入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谱写了精彩而唯美的篇章；另一方面，受到考据学兴盛以及清初统治者重视家庭稳定因素的影响，社会舆论虽然较多关注女性对传统道德标准的遵守，但与此同时，以江浙一带为中心也出现了一大批鲜明支持女性走出闺闼，并公开与之唱和、交往甚至招收女弟子，发出“女子重才不重德”言论的文士，为闺秀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可以说，这一切绝非偶然。在研究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闺秀创作

及其诗学理论提出的文化生态环境。这是对形成、影响或干扰其走向的大环境做出的探索，为分析其思想特征奠定基础。二是对闺秀参与诗歌创作并发表诗学见解的心理特征与心理需求作出研究，从而分析其价值与影响。三是对促成闺秀诗学观全面定型的直接渊源作出评判，从而准确地把握其诗学观念的构成及内部细节特征。四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握各个地区，不同身份、阶层的女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持的诗学观及其具体表现与分类，力求条分缕析地梳理整个清代闺秀诗学观的全貌。

20 世纪 50 年代，胡文楷根据历代正史艺文志、各省通志、府州县志及闺秀诗文词集与各类诗话著作中有关女性文学创作的记载，编著了《历代妇女著作考》21 卷，收录了自汉魏六朝至近代的女性作家 4000 余人，其中，明清两代共有女作家 3750 余人，占中国古代女性作家的 90% 以上。其中清朝一代就有 3500 余人，又占明清两朝总数的 90% 以上。从地域分布来看，在这 3000 余名女性作家中，仅江浙两省就有 3000 人左右（胡考所载有缺漏，据南京大学史梅女士补遗，数量应该更多），又占清代女性作家的 80%。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女性比重最大的是清代的江浙地区，这个数据也足以说明江浙一带作为清代文化重镇其标志性的意义。因此，我们对清代闺秀文学的探讨，对其范围的界定，实质是以江浙两省为中心辐射全国而形成的文学生态圈。本书中，我们对闺秀文学创作及其诗学思想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

早在民国初年，我国学者就已经展开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比如梁乙真的《清代妇女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单士釐的《清闺秀艺文略》、童



振藻的《清代名媛诗录》等，对妇女文学的极盛与衰落、文士与妇女文学的关系、女性作家的籍贯、经历、著作的考订及女性文学创作演变的因由等作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而对女性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相应地也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出版，比如辉群的《女性与文学》（1928年启智书店出版）、胡云翼的《中国妇女与文学》、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等，着重于从女性的创作处境、生命状态等维度阐释古代女性的文学际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上文提及的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胡文楷先生的一部专门记载历代妇女著作的解题书目——《历代妇女著作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更是古代女性文学研究的重心，近来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著作，比如美国学者曼素恩的《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及高彦颐的《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台湾地区学者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清代女作家专题——吴藻及其相关文学活动研究》、王力坚的《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大陆学者陈玉兰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段继红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闺阁文学研究》等一系列佳作。南京大学还于2000年5月专门召开了以“明清文学与性别”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张宏生与张雁还组织编选了《古代女诗人研究》，这些成果都为推动清代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目前，我国对清代闺秀文学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闺秀文学在清代极盛现象的深入探讨；二是对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比如席佩兰、顾春、吴藻、贺双卿、徐灿、沈善宝、归懋仪、汪端等）文学创作的艺术分析，比如文学题材的选择与艺术风格的形成等；三是对女性诗人群

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一门联吟）等。而对一些更为深入的论题，比如文士结社对闺秀诗学观念的影响、清代各历史阶段各地区文学女性的心理特征及其产生变化的原因与相互影响、女性文学书写及其文学观念的价值与影响、不同身份闺秀进行文学创作的目的及过程与方式等问题，都还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发现与深入开掘。本书力图从微观的角度对清代江浙地区闺秀诗学观念的形成渊源、特点及与当代文士诗学观念的交叉互动关系，对清代特有的女性诗学蔚为大观的现象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总结。对于青楼女子诗学思想，本书暂不讨论。

第一章 清代闺秀的生存环境与文学交际

清代女性文学创作进入历史的极盛期，胡文楷称其“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历代妇女著作考》）是很恰当的。近代著名学者梁乙真在其《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第七章列专篇“清代妇女文学之极盛”对清代女性创作的繁荣现象及发展阶段作了这样的描述：

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连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时者矣！往年余著《清代妇女文学史》，其所叙录者，几及千人，兹编所述，仅举其著者，且吾意在补苴阙漏，故所叙诸人诗史，亦不与前书尽同也。余惟清代妇女之文学，其发达程序，可分三时期言之。第一，明清过渡中，若商景兰、黄媛介、吴严子、方维仪诸人，以及蕉园诸子，则初清作家也；第二，乾嘉之际，国运方盛，士大夫多优游于文学，而“仓山碧城”诸人，又复提倡风雅，故妇女作家，亦多如过江之鱼，此中世文学也。道咸以后，国家多故，士大夫无复致力于文学之途，而风气之变，妇学之光焰顿微，此第三期也。^①

^① 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第七章“清代妇女文学之极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梁乙真先生在这里指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其创作主体是“才媛淑女”，这意味着女性作家身份由青楼女子向闺秀的重要转变；二是在清朝十二帝268年的统治期，并非所有阶段的女性创作都具备相同的特色，而是受朝代更迭、文化重心的转移及文学观念的变迁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对清代闺秀创作也应该作分阶段研究的考虑。

本章所探讨的重心，实质上是清代文学闺秀的生存环境，它包括文学女性身份由青楼向闺秀转化及个中原因分析（这正是研究清廷文化政策变动及女性观念变迁的重要依据），世家大族对闺秀的培养及著名文士对闺秀创作的积极多元支持等。清代闺秀不仅在一门之内唱和联吟，更是走出闺阁与众多知名文士有着或多或少的文学联系，不同程度地得到文士的支持与鼓励，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谱写了她们参与结社与组织结社的文学新篇章，产生了大量佳作，并于此中大胆表露出对女性诗学、文士诗学观念的见解，形成了独特的闺秀诗学观。

第一节 清代闺秀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清代文学女性身份的新变及其成因

清代文学女性身份的新变，即是由青楼向闺秀的过渡。在明代末年，一些文士就开始倾心于整理前代或者当代女性的文学作品，并予以出版。华裔学者孙康宜曾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明清妇女诗词选集及其编选策略》的文章，她在文中明确指出，最迟在晚明时期，文士就已经开始重视女性的文学创作，并注意到其作品流失严重这一问题，力图借助出版的方

式来保存这些文献。选集的出版不仅保存了文献，更是成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当然，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主体并非闺秀而是青楼女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则是南明王朝偏安江南，士子们集体徘徊于秦淮河畔，自然其唱和的对象以秦淮名妓为主，而出版的对象也以秦淮名妓为主了。至清代，这样的局面才开始得到改变。清代著名女诗人恽珠在编选《国朝闺秀正始集》时，在例言中这样写道：“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之前文士所热衷出版的所谓女性文学集，其内容亦多“风云月露”之作，格调不高；另一方面，在《国朝闺秀正始集》中，清代学者更倾向于雅致贞洁的闺秀所作之诗文，这不仅体现了审美倾向的转变，更与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及文化政策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究其原因，首先，清朝妇学十分兴盛，清代统治者对家庭的稳定十分重视，尤其强调妇女的贞洁。此间出现了许多大力鼓吹妇德的教本，比如陆圻《新妇谱》、任启运《女教经传通纂》、贺瑞麟《女儿经》、曾懿《女学篇》、朱浩文《女三字经》、尹会一《女鉴录》、王相母刘氏《女范捷录》、陈弘谋《教女遗规》等。以成书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21）、清代最早的女教之书、蓝鼎元所辑《女学》为例。《女学》即以补教风化、规范闺门之道为宗旨，依据《周礼》妇学之法，采辑百家及《女诫》《列女传》等书总括其要，并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篇，详细叙述妇德的具体内容，形成一整套束缚妇女的所谓准则，其曰：“凡为女子，先学立身……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

①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81页。

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①由此卫道士便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衡量女性的标准，限制女性才智的发挥。因此，社会上不仅反对女子进行文学创作，还反对女子读书识字。明代吕坤《闺范图说》即说：“女子无仪，且不以学名，况诗乎！”^②另外，甚至出现了大量无名氏编著的普及读物，比如《闺训千字文》《妇女一说晓》《绘图女儿三字经》《改良女儿经》《闺阁箴》等，更是在社会上以“劝善书”的面目涌现。其次，随着考据学的兴起，社会舆论更加重视妇女对传统道德标准的遵守。再次，清代，江南作为文化重镇，世家大族兴起，闺阁女子逐渐成为主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才学的青楼女子逐渐淡出土子的视野，日益边缘化。

二、世家大族及文士对闺秀创作的支持

在宗法制社会及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古代妇女，其创作的不易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清代，世家大族却成为闺秀文学繁盛的温床，在家族之中，母系、父系、夫系的成员不论在思想意识、文学涵养上，还是在生活经历与学术成就上，都会或深或浅地在闺秀文学创作中打下烙印。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引用了近代岭南才女洗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后序对闺秀创作获得成就的三个条件的评价：“其一名父之女，少稟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

① [清] 蓝鼎元辑：《女学》（六卷），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② [明] 吕坤编：《闺范图说》，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① 冼玉清的见解是极其深刻的，这至少说明了女子扬名的身份前提，这是家族内部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于家族外部，清朝统治者重视女子的风气也对女性文化身份的提高有着不可抹杀的作用，这也促使了经济富庶的南方世家往往以家中出才女为荣。在清代的江苏省，文化世家比比皆是，比如常州张氏家族（常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张琦及其兄张惠言）、毗陵庄氏家族（有二十七位女性作家）、太仓毕氏（尚书毕沅）、江都阮氏（阮元）、常熟宗氏及邵氏、华亭张氏等，而江苏仅吴江就有七大姓氏家族，其闺秀文学创作极度兴盛，它们分别是沈氏、计氏、周氏、王氏、邱氏、宋氏、吴氏、柳氏。比如吴江沈氏，其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世家，从沈奎开吴江沈氏文学之先河后，历时十一世而不衰，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其一门之中的著名文人比如戏曲家沈璟、闺秀诗人沈宜修（叶绍袁之妻）等均出其门。再以常州张氏家族为例，张琦有四女，自幼对家学耳濡目染，据其次女纬青在《纬青遗稿》中的记载，其父张琦还曾与她们“夜分篝灯，谈说今古”，足见张琦对其女的直接熏陶与影响之深。其长女孟缙著有《澹菊轩诗稿》，并辑录闺中诗为《国朝列女诗录》，次女纬青著有《纬青遗稿》，三女婉绌著有《绿槐书屋诗集》，四女若绮著有《餐枫馆文集》，若绮又有四女，分别为王采蘋、王采繁、王采藻、王采蓝，都有文采。道光三十年（1850），包世臣女婿张曜孙辑录四女著作，合刊为《阳湖张氏四女集》，并在其《棣华馆诗课》序言中记载了张氏一门两代闺秀文学活动的兴盛：

① 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后序，转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增订本，第951～952页。

余喜其敏慧好学，又病中无所事事，日与论诗画读书以遣。诸女子之出塾者，皆令督课之。及官武昌，伯姊孟缙自京师先至，乃迎婉训、若绮来居官室，见诸女皆长成，学日进，甚乐之。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磨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事物。凡读书作诗文画书、治女工皆有定程，而中饋酒浆琐屑之事，各于其闾为之不废，日无旷咎，语无杂言。^①

张曜孙在这篇序言中讲述了当时张氏闺秀一门风雅的情景，反映出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世家大族里，闺秀的成长与同族文士的督课引导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此类闺秀联吟已经成为世家之中女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且已融入了她们的生命；再次，正因为没有“米盐井臼之劳”，也“无膏粱文绣之好”，因此方给大家闺秀们提供了足够进行文化及文学活动的空间与机遇；最后，闺秀联吟的内容，并非简单描写花红草绿、悲欢离合，抒发其多愁善感的闺中女子之常情，而是“磨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事物”，似乎已非女子所为，而俨然具有当下名士之风，这也被学者们称为“文士化”，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以上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世家大族对闺秀文学创作的影响，下面将从微观的角度，即从闺秀出身家庭的精神熏陶及其出嫁之后与丈夫之间的精神关联两个角度，分析闺秀文学思想之根基及其变化。

诗之品第高下往往与诗人之德义高低有相吻合之处。文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世家大族对闺秀子女的诗学影响，当然不

① [清]张晋礼编：《棣华馆诗课》（清道光三十年棣华馆刊本），张曜孙序。

仅仅体现于直接的诗学观念的融合、传递与借鉴，有时往往借助对人的品评来实现。比如清代浙江钱塘闺秀汪端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汪宪，早成进士，官刑部员外郎，但二十六岁即乞养告归，其父汪瑜候选布政司，却归隐不仕，都体现出其志节与傲骨，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汪端。加上在其母去世之后，其父专门延请秀才高迈庵课其读书，将之视为掌上明珠，又可见其影响之深，因此，当其父取宋元明及本朝诗教汪端时，她独留高青丘、吴梅村两家，最后去吴留高，并以诗评的方式说出各种原因：“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高启为明初长洲著名学者，“吴中四杰”之一，元末曾隐居吴淞江畔，明初受诏入朝修《元史》，授翰林院编修，其思想以儒家为本，兼受释、道影响，厌倦朝政，不羨功名利禄。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拟委任他为户部右侍郎，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后被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一案腰斩于南京。从隐居的经历到骨子里的志节，汪端家族都与其有相似之处，因而重其“澹而有品”，实则澹而有骨。汪端说出如此诗学观念就不足为奇了。

世家大族的影响，对于闺秀而言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指女性自己出身的家庭，更是指其出嫁后所在的家族，而这似乎对其后期诗歌创作及诗学观念的最终定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以钱塘闺秀汪端为例，其父因闻陈文述之子裴之才华出众，又阅其《春藻堂初集》而甚喜，便在嘉庆十二年（1807）使汪端与裴之订婚，汪端当时只有十五岁。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初五，十八岁的汪端嫁给了陈裴之。在陈家，汪端受到其公婆笃信道教的深刻影响，也修道请业，自然，在她的诗歌创作及诗学观念中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汪端自学道以后，不但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态

度也截然转变。比如，陶云汀约陈文述共同续选《国朝诗别裁集》时，陈文述曾征求汪端的意见，汪端却劝其勿参与《国朝诗别裁集》的编选：“翁生平虚怀若谷，不以文学自矜，故忌者尚少。若操此选，过宽则滥，过严则隘。此中前辈各有后人，请托不行，谤讟易起。端前此尚可助翁定去取，奉道以来，觉此事不甚有味。翁亦道缘深矣，不宜更以此扰清净心。”^①显然，受到道家无为观念的影响，汪端告知陈文述不可轻易参与国朝诗的编选，其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到“若操此选，此中前辈各有后人，请托不行，谤讟易起”，还是保持“虚怀若谷，不以文学自矜”，少招人忌为好；另一方面，则是因其家人修道，道家讲究清静无为，因此，不可“以此扰清净心”。这则事例很能说明闺秀在出嫁以后受到婆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并将其内化的过程。当然，这其中更多的则是通过闺房唱和，与丈夫诗学观念的彼此影响。比如王采薇与其丈夫孙星衍之间的唱和，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二中记载：“其闺房唱和诗，虽未经兵备（指孙星衍）裁定，然其幽奇恹恍处，兵备亦不能为。如‘青山独归处，花暗一层楼’‘一院露光团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类数十联，皆未经人道语。”^②足见其技艺切磋背后诗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又如一代文宗阮元的妻子孔璐华在其诗稿自序中不经意地说到了丈夫阮元的思想观念、生活经历、情感审美等对她的影响：“幼年读《毛诗》，不能颖悟，兼又多疾，先君怜之曰：‘愿汝能学礼，不必定有才。吾家世传诗礼，能知其大义即可矣。’于归后，丈夫喜言诗，始复时时为之。又因宦游浙江，景物佳美，得诗较多。”孔璐

① 蒋寅：《清代文学论稿》，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

② [清]洪亮吉著，陈迺冬校点：《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华所言实际上说出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家庭关联与作用，这也正是生活于世家之中的闺秀最重要的文学生存背景。

正是得益于世家之中文士思想情致、文学涵养、学术成就等方面的影响，清代闺秀之作在情感、题材、格调等方面都集中地超越了前代而具有了更多公众话语的身份。总而言之，世家大族对闺秀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塑造了其文化身份，使其表现出多才多艺、眼界开阔、生活感受丰富、思想敏锐、知识面宽的特点，同时也表现出“于经济治体，无不通达”^①、社会交际拓宽等综合特点，这也是我们研究清代女性诗学思想的一个必要前提。

以上我们简单阐述了清代以江浙地区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存在及其对闺秀文学创作的重要支撑与影响，接下来再谈谈文士对闺秀创作的态度及对闺秀文学思想的影响。

在清代，女性的传统职能被发挥到极致，比如社会对贞洁观念的极度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作为社会的主要思想等，都严重限制了女性走出闺阁的自觉与行动。学者陶秋英曾在其著作《中国妇女与文学》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女性贞洁观逐步深化的过程，她指出：“女子贞操的学术是立于汉代的儒家，但事实上，汉代的社会并不曾受其大赐，唐代对于贞洁观念仍然很淡薄，宋代由理学的发达进至于礼教的大进步，由礼教的大进步而进至于女子贞洁的被极端重视，明代成为贞洁最重视最发达的时代，到了清代，什么都到了极致，贞洁成了女子的天责。”^② 陶秋英指出了当时妇女贞洁观念至高无上的现实，因此，才会有一些以传统儒家伦理与程朱理学为

① [清] 沈善宝：《名媛诗话》评骘珠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北京：北新书局，1933年版。